

# 後冷戰時期東北亞 國際政治結構

邱 坤 玄

## 壹、前 言

東歐巨變，蘇聯帝國瓦解，就全球體系層次而言，東西冷戰確已結束，但在有些區域體系之內，仍然存在着冷戰時期的部份特質。就全球體系結構而言，二元的基本架構已被打破，但新的結構仍未形成。過去世界格局的轉變，大都是因為世界大戰的結果。戰勝國經過條約安排，導致世界政治地圖以及權力分配的改變，此種過程相對而言較為快速，同時無須經過一段過渡時期。當前體系結構的改變，很慶幸地是在沒有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發生，但是在新的格局形成前，就自然會有一段過渡時期，在此期間內，權力將進行重新組合，國際間的議題與組成份子間的互動方式也將產生改變。

在上述的前題下，本文嘗試用宏觀的角度探討後冷戰時期東北亞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現狀與未來可能的發展。宏觀的角度主要是討論結構的形式及其對結構內成員的影響與彼此互動之關係，它較

---

※作者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能掌握主要之趨勢。既是宏觀，就不可能對區域內雙向關係詳細地分析。所謂東北亞地區是指中共、日本、南北韓、中華民國、蒙古、而美國與舊日蘇聯（今之俄羅斯）因為與東北亞地區關係與利益一向密切，也應視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成員。而蒙古雖在地理上屬於東北亞地區，但在區域內地位與作用不大，因此不列入討論範圍。

## 貳、東北亞體系轉變之背景

促使東北亞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產生轉變的最主要原因為東西冷戰結束與蘇聯之瓦解。在此結構性轉變情形下，構成份子的相對地位與互動模式亦隨之不同。蘇聯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臺前二十年，大肆擴充軍備，嘗試以武力作為其亞太政策的基石。然而此舉非但未能達成稱霸亞太之目的，反而引起亞太地區國家之戒懼。同時也造成蘇聯國內經濟的困境。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臺之後，深感蘇聯經濟落後，必須改造。為達此目的，戈氏認為不僅要在國內發展民主，同時也要尋求有利改革之國際環境。在「新思維」觀念的主導下，戈巴契夫發表了一連串的亞太政策聲明，以促成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軍事穩定與裁減軍備。（註一）而戈氏所採之實際行動，對東北亞形勢的緩和更有助益。其主

註一：有關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及其亞太政策，請參考Mikhail S.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Rajan Menon, "New Thinking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rch-June 1989): 1-29; 畢英賢，「蘇聯的改革與亞太政策」，*問題與研究*，第29卷，第1期，頁14-23。

要措施包括於一九八九年一月自阿富汗撤軍；如期在亞洲地區片面裁減二十五萬軍隊；撤減它在外蒙駐軍的百分之七十五；開始銷毀亞洲部份的所有中程飛彈。（註二）這些措施固然源於戈巴契夫的主動，但也顯示出過去蘇聯以軍事為主的亞太政策的錯誤，因為它並未有效反應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的動態發展。（註三）由於戈氏的主動，使東北亞區域內國家不再將蘇聯視為具有明顯而立即之威脅，南韓與蘇聯關係的迅速發展，就是此種認知轉變的最佳例證之一。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聯邦合法繼承原蘇聯之外交地位並延續其外交政策。葉爾欽(Boris Yeltsin)出掌俄羅斯聯邦之後，繼續採取裁軍行動，削減戰略核武並銷毀所有地面發射的短程核子武器。（註四）此外，蘇聯解體後組成之獨立國協，無一成員有意願及能力與美國爭取世界之領導權。美蘇兩極對峙之結構已不復存在，而冷戰時期組成權力的軍事、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因素之比重亦為之改變。在軍事方面，核子武器的實用性及政治作用更為降低。核子競賽已被經濟競賽所取代，經濟與科技發展成為各國施政之重要目標，因此經濟科技力量將成為國家權力之重要指標，在國際政治權力結構中的比重相對升高。冷戰結束，也打破了以意識形態區

註二：Dnityr V. Petro, "Perestroika and Changes in the USSR's Approaches to the Post-Yalta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Winter 1990):505—506。

註三：Stephen M.Young, "Gorbachev's Asian Policy: Balancing the New and the Old," *Asian Survey* 28 (March 1988):317—339。

註四：David Shambaugh,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urvival* 34(Summer 1992):96。

分國家集團之界線，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嘗試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之措施。

因此，冷戰時期主宰東北亞體系的美蘇中共大戰略三角關係因而瓦解，中共也無法再發揮在戰略三角中的制衡角色。雖然過去有人質疑中共是否足以扮演三角中之一員，但美蘇聯兩國的確將中共視為拉攏對象以增強彼此之國際地位。而經濟因素重要性之相對提昇，也使得具有經濟實力的國家，將可能發揮更多之影響力。

## 參、轉型中之東北亞 國際政治結構

基於體系中構成份子相對地位之改變，東北亞體系在轉型中呈現出下列幾個特徵。

### 一、結構層次

#### 1. 地區強權重要性提高

當前國際體系由兩極漸生多元，經濟發展在國際議程中，已逐漸重要。東北亞地區之共產主義政權，經濟落後，極需外來資金與技術，以利其經濟改革與發展。原是二次大戰戰敗國的日本，現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巨人。日本土地面積約為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及美國一半，但其國民生產總額則為美國的百分之六十，穩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此外，日本國際金融實力雄厚，多年來一直是世界最大貿易順差國之一；在科技方面，日本也在許多領域領先美國，對美國造成嚴重的挑戰。（註五）。

在東北亞地區，日本逐漸取代美國，成為該地區資金與技術的

主要來源，同時日本也在東北亞國家進口市場佔有很高的比例。相對地日本卻非東北亞國家出口的主要市場。這種貿易上不平衡的關係，使東北亞國家在經濟、貿易上高度依賴日本，減低了他們對日本討價還價的能力。因此許多分析家認為日本已經由經濟手段，達成了過去以軍事手段無法完成的「大東亞共榮圈」目標。（註六）

但是日本在此地區的經濟霸權也引起區域內國家疑懼。東北亞國家對二次大戰時日本的侵略行爲記憶猶新。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事實上是當時東京藉經濟建設爲名，而遂行其控制東亞國家的目的。而目前日本在東北亞地區的經濟活動，佔有貿易與投資市場，唯利是圖以及條件嚴格的外援，似乎成爲另外一種形式軍隊的象徵，更引起區域內國家對日本的敵意。

此外，日本憑藉其經濟實力，意圖成爲政治大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如派遣非戰鬥人員參與制裁伊拉克戰爭，以及通過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方案(Peace Keeping Operation, PKO)更引起區域內國家嚴重的關切。日本是否會挾其世界經濟巨人的資本，轉變成軍事強權的角色？美國及區域內國家均有共識，必須防止此種角色的產生。（註七）因此，美國雖然逐步進行在東北亞撤軍之計畫，但仍然維持相當之軍力，一方面防止權力真空；另一方面也可藉此制

註五：William R.Nester, *Japan's Growing Power over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Ends and Mea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p.219 - 227。

註六：Ibid., p.13。

註七：Jonathan Pollack and James A.Winnerfeld, *U.S. Strategic Alternatives in a Changing Pacific* (The RAND Cooperation, June 1990), Chap. 3.

衡日本之野心。

在美蘇中共戰略三角不復存在，而美國成爲世界獨強的情況下，中共積極尋找增進與區域內國家的關係，以制衡美國的霸權。除了戰略上的考量，中共基於現實經濟利益，更有意願成爲區域的強權。中共目前與東北亞地區內國家經濟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強，在西方國家貿易保護日益高漲的情形下，中共與區域內國家的貿易大幅成長，從此區域吸收的外貿與貸款更已超過美國及西方國家。中共成爲地區性強權，有主觀的戰略與經濟考慮，同時也有客觀的實力作爲依據。

因此，東北亞地區政治權力結構的主要特徵，將是美日中共三角關係的運作。美國雖一再強調美日安全關係爲其亞太政策的基石，但美日經濟摩擦將成爲雙方關係之嚴重障礙。美國與中共關係目前仍陷於低潮，將來可能因爲政治制度與價值信念之不同而發生衝突。就長程而言，日本與中共有可能在區域內互相抗衡，雙方目前均將對方視爲潛在敵人（註八）。雖然中共與日本經濟關係密切，而二十年邦交關係亦日趨穩固，但雙方之歷史仇視情緒，亦不容忽視。

## 2. 區域經濟合作的趨勢

東北亞地區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成長向爲世界矚目，而社會主義國家也跨越意識形態界線，尋求經濟合作以利其經濟發展。爲了解決因經貿發展而衍生的貿易投資、技術轉移與政策協商等問題，經濟合作益顯重要。從外在環境而論，歐洲共同體即將成立單

註八：Shambaugh, *op. cit.*, p.97。

一市場，美、加、墨已簽約成立自由貿易區，以及國際間仍存在著保護主義，更加深了地區經濟合作的意願，以確保區域內國家的共同利益。

日本對加強亞太經濟合作態度最為積極，提出建議與構想也最早與最多。一九六〇年代初，日本小島清教授(Kiyoshi Kojima)即首先提出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註九)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由於體認到區域內國家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情況不一，自由貿易理想不易實現，因此轉為尋求較為鬆散的協商合作機制，以符合區域的需求。

在眾多的區域合作機制當中，民間企業組成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與具有產、官、學性質的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PECC)，自成立以來，對推展亞太經濟合作頗有貢獻。(註一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澳洲坎培拉召開之亞太經濟合作部長級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由於具有官方性質，其地位頗受重視。首次會議計有來自美、日、加、澳、紐、韓、菲、泰、馬、新、印尼與汶萊等十二國之外交及經貿部長參加。與會國家堅強承諾成立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避免成為封閉的貿易集團。合作的方式是以區域內經濟體透過

---

註九：有關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之發展，請參考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pp. 133-156; 劉泰英，「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之回顧與展望」，第三屆「亞洲展望」研討會，台北，民國80年9月20日至21日。

註一〇：同前註。

非正式的諮商、交流進行，以加強互賴的成果，包含鼓勵與促進財貨、服務、資金與技術之流通。（註一一）第二屆亞太經合會於一九九〇年七月在新加坡召開，將會議定義為一提供「各經濟體高層代表非正式諮商之議壇」，（註一二）以排除因會籍問題而可能產生之糾紛。一九九一年底，第三屆亞太經合會部長級會議於漢城召開，正式邀請我國、中共與香港三方赴會，經濟因素的考慮再次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約束，成為國際間主要的互動方式。

前述經貿集團的組成，均以亞太地區為範圍，一九八七年與一九八八年間，日韓學者倡議組成較小範圍的「泛黃海經濟體」，由日本面臨日本海的地方、朝鮮半島北方與南方、中國東北地方以及蘇聯西伯利亞遠東地區進行經濟合作，（註一三）但此建議並未得到有關國家的支持。

後冷戰時期的發展，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提供了更有利之趨勢。二次大戰以來以美國為市場的美、日、新興工業化國家所組成的跨太平洋三角關係已逐漸演變成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東南亞國協會員國組成的既競爭又互補的雁形發展模式，（註一四）逐漸出

註一一：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16, 1989, pp.10-19。

註一二：劉泰英，同註9，頁8。

註一三：Kuang-sheng Liao,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 Introduction," in ed., *Politic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p.8。

註一四：Kent E. Calder, "Japan and the N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ising Interdependence," in Clara Joewono and Harry H. Kendall, eds., *Japan, AS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225-234。



現水平與垂直分工，為經濟整合打下基礎。但是，根據現有經驗，區域經濟合作可以分為五個層次—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同盟、經濟全面一體化。而亞太地區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努力，仍然無法形成最鬆散的自由貿易區，因此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仍有待努力。

### 3. 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與區域經濟整合息息相關的是各國紛紛採行市場經濟的措施。東北亞的例子更為顯著。（註一五）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所採取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結果造成經濟結構失衡、缺乏生產動機與效率，並引起嚴重之預算赤字。相反地，區域內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國家，如日本不僅是區域更是世界經濟巨人，南韓與中華民國雖然採取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前者著重發展大企業、以增加國防競爭能力，而後者則以中、小企業為主，活力充沛，但是他們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成員，經濟發展成果卓越。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使東北亞地區內的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不得不改弦更張。蒙古目前面臨重大之經濟問題，正在尋求日本及其他經濟國家援助；它同時與美國接觸以學習民主的制度。中共經濟改革已進入第二個十年階段，強調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註一六）制度，也廣泛地發展與市場經濟國家之關係，並且時時重申改革與開放路線已是既定政策，無法改變。北韓在面臨南韓北方政策與國內經濟困境壓力之下，也開始

註一五：Robert A. Scalapino, "Northeast Asia—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5, no.2, 1992, p.01。

註一六：見中共十四大政治報告，文匯報，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三日。

與日本協商關係正常化，與南韓展開直接貿易，簽訂政治、軍事協議，為減低雙方情勢提供良機。（註一七）而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也尋求擴大在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其優先次序為中共、日本、南韓，（註一八）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則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昔日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改弦更張與蘇聯解體，就樂觀地斷言共產主義已經瓦解。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雖已挫敗，但是在政治上仍是有效之統治工具，（註十九）同時全世界仍然有近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治制度之下。中共認為東歐巨變、蘇聯瓦解主要是沒有制定符合國情特性的經改政策，（註二〇）因此只有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下，做好市場經濟工作，共產主義的政治措施將持續堅持。就這點而言，中共的改革與開放仍有其限度。就本質而言，中共仍徘徊於「體」與「用」之間的兩難之中。中共所堅持的「體」屬於左的一面，而「用」則是偏向右的路線。政左經右，政是體，而經則是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前者是體必須堅持，後者是用，但不能超越體的範圍。在外交上，中共採開放政策，傾向區域與國際主義，是用的表現，但要保證不干涉到中國內政，其體就是民族主義。如何調和體

註一七：Donald S. Macdonald, "The Role of the Major Powers in the Reunification of Kor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5 (Summer 1992): 135-137。

註一八：*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 26, 1992, p.24。

註一九：Richard Nixon, *Seize the Mo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22。

註二〇：「從『反和平演變』看中共對蘇聯政局的反應」，中共問題資料週刊，民國八十年九月九日，第四八四期，頁9-11。

與用之間的矛盾，是中共必須面臨的最大課題。

蘇共的瓦解，亦造成中共與北韓、越南關係的加強，以強化共產主義陣營，共同對抗民主改革的浪潮。此外，俄羅斯聯邦之內，由於經濟改革沒有帶給人們直接福利，通貨膨脹仍極嚴重，因此保守勢力亦有可能重組與反撲，而事實上，俄羅斯人民也有支持此種勢力的跡象。（註二一）因此，斷言共產主義業已消失，太為樂觀。

## 二、單元層次

### 1. 分裂中國家關係持續和緩

東北亞地區分裂中國家過去在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各方面的對立，為冷戰時期最具體之縮影，也是造成地區不穩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冷戰後的發展則頗令人鼓舞。在兩個韓國方面，一九九一年底與一九九二年初的發展與以前的尖銳對抗有顯著的差異。一九九一年九月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在十二月舉行的南北韓總理會談時，雙方簽訂了幾乎涵蓋所有政治、經濟與安全關係的二十五點協議。其中包括互不侵犯與裁減軍備；停止敵意宣傳與互不干涉彼此內政；擴大經濟與文化交流，並且設立常設委員會以促使協議之執行。

此外，布希總統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宣佈將自全球撤回所有戰術性核武，其中包含南韓。南韓政府則於十二月宣佈在其土地上已沒有佈署任何核子武器，因此要求北韓接受實地檢查彼此核子設施的

註二一：畢英賢，「俄羅斯政經現況與發展趨向」，問題與研究，第31卷，第10期，民國81年10月，頁32。

建議。鑑於情勢發展的迅速，北韓亦有鬆動的現象，同意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保證條約。（註二二）如果北韓所言沒有能力與意願製造核武足以採信，並且願意接受實地檢查，則不僅南北韓關係將進一步和緩，交叉承認亦將早日實現。

臺灣海峽兩岸的情勢發展，也正朝向緩和的方面進行，但不如南北韓關係一般具有突破性。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海峽兩岸經過近四十年的完全隔絕，互信不易在短期間內建立。此外，中共至今仍不願放棄以武力作為統一的手段，而我們境內也存在著國家認同的問題，為海峽兩岸關係增加不安之變數。（註二三）這兩項因素在其他分裂中國家都不存在，也是中國統一的重大障礙。第二，在海峽兩岸相對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我國對統一問題的作法是採取功能性的途徑，藉雙方的功能性交流，逐步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這是一種和平漸進的過程，較缺乏突破性進展。而南北韓的統一進程，則是先透過政治的安排，再建設下層組織，在南北韓雙方力量較平衡狀況下，此種方式較有執行之可能。

## 2. 民族主義勢力的興起

東北亞地區之內國家自主權升高，經濟發達，提高了國家的自尊與地位。另外因為民主化的需要，帶動了民族自決的風潮，可能導致國家的分裂，為地區內帶來動盪的因素。不論是何種形式的民

註二二：Scalapino, *op. cit.*, p.107。

註二三：有關我大陸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請參考馬英九，「四年來的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34卷，第12期，民國80年12月，頁10-26；及趙先運，「中共『對台政策』與『對台工作』的評析」，*東亞季刊*，第23卷，第1期，頁1-19。

族主義，對東北亞形勢都將有深遠的影響。

南韓近年來一連串的外交出擊，就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最佳例證之一。南韓對本身成就充滿自豪，公眾希望改變過度依賴美國的安全關係。同時南韓也漸有信心對抗北韓之挑釁。此外憑藉其經濟實力而推展之北方政策也獲致重大之成就。除了與東歐國家及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外，更於一九九二年八月與中共建交。南韓之外交突破，不僅可擴展其經濟活動，更可藉此約束北韓之蠢動。

中共一向以民族主義作為號召團結之工具；在外交上更可藉此抗拒西方思潮之入侵。蘇聯瓦解，境內各共和國紛紛獨立，蒙古也進行大規模民主改革，中共深恐大陸少數民族伺機效尤。而臺灣島內也有少數人利用民族主義，倡言獨立，為海峽兩岸以及東北亞地區添增不安之變數。

就初步之觀察，中共境內少數民族分離運動將比前蘇聯遭遇更多的困難。首先是人口比例的因素。中共在大陸推行的移民實邊政策頗有成效。漢人在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人數比例不低，新疆居民中有四成以上是漢人，內蒙古居民中漢人超過蒙古人，（註二四）。中共仍能有效控制。此外，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程度，大都比同文同種的鄰近國家要高，內蒙的工業就遠勝於蒙古，因此外蒙在蘇聯勢立撤退後，只有與內蒙加強合作。

### 3. 軍備競賽的趨勢

不安全感與具備購買能力為武器競賽的兩大動機。東西冷戰結

註二四：丁學良，「依附外邦利害生存，台獨無根」，聯合報，民國八十年十月六日。

束之後，全球武器交易顯着下降，惟有中東與亞太地區的武器競賽卻有擴張之趨勢。前者因波斯灣戰爭之故較受矚目，但很少人注意亞太地區武器競賽上升之現象。自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一年間，全球十五大傳統武器進口國家中，亞太地區佔了七國，而東北亞就佔了五國。（註二五）其中，日本一向致力於發展，購買最先進之防禦武器，將來仍會持續此種型態。在朝鮮半島安全困境尚未完全解決之前，南北韓仍需維持強大軍力以維安全。南北韓兵力總數超過一百五十萬，北韓軍事預算佔其國民生產總額之百分之二十，南韓雖比例較低，但其絕對數額仍然可觀。（註二六）中華民國在中共威脅仍未減低與爲了更新其老舊戰機情況下，最近也向美國與法國購買先進戰機。

在蘇聯瓦解，美國減少在外駐軍之際，中共雖然強調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利其經濟改革，但爲了填補美、蘇撤軍後造成的真空，並保衛自己所認爲擁有之領土（如南沙、西沙、釣魚臺等），中共將提升其戰力以應需要。而一九九一年高科技的波斯灣戰爭對解放軍戰略觀念有極大的震撼，使中共會繼續品質提昇的建軍工作。中共軍方在「六四」事件之後，預算逐年升高，三年來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註二七）同時近兩年中共外匯充足，使中共軍方較一九八〇年代更有能力向外購買武器。

註二五：Gerald Segal, "Managing New Arms Rac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5 (Summer 1992): 84-85。

註二六：Douglas M. Johnston, "Anticipating In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ibid.*, p.136。

註二七：Shambaugh, *op. cit.*, p.103。

#### 4. 中（共）俄關係的強化

中共於一九八二年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除了對當時美國對中華民國政策表示不滿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想促進與蘇聯關係正常化。在西方不是完全信賴情況下，中共必須與其鄰國，特別是蘇聯維持和平友好關係，以利其經濟發展。此種戰略構想，即使在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立之後仍然有效。新成立的俄羅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逐漸重視對亞太地區的關係。中共為亞太地區強權，自為俄羅斯發展關係的目標。此外，俄羅斯正大量出售武器以賺取外匯，發展經濟。中共由於長期使用蘇式武器系統，正是俄羅斯武器銷售的最大市場之一。同時在經政問題之上，俄羅斯亦可從中共政策中吸取經驗。

中共與俄羅斯，最近已簽訂了互不侵犯、武器交易、科技合作、核能發展等協定。（註二八）一九九二年雙方貿易額達到歷年最高記錄，接近50億美元。而中共已向俄羅斯購買二十四架蘇愷27(SU27)戰機，其他武器包括米格31(MIG31)攔截機、飛彈導航科技、火箭引及科技等。（註二九）雙方雖然無法回到一九五〇年代同盟關係，但以目前發展觀察，中（共）俄關係的走向，勢將成為影響東北亞權力結構的重變數。

#### 5. 美國角色的調適

美國一直自認是個太平洋國家。二次大戰後，美國積極介入亞太之政治、經濟與軍事事務，以推展其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理

註二八：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7, 1993, p.16。

註二九： *Ibid.*, November 26, 1992, p.24。

念，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與亞太盟邦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及其他非條約的安全關係，主要目標就是要嚇阻蘇聯的擴張。這些安全的部署，由於冷戰的結束與美國認知的改變，而必須予以調整。美國認為(1)蘇聯瓦解與美蘇武器管制的成果；(2)多數亞洲國家民族自尊逐日增強，普遍認為美國在其境內駐軍是侵犯主權的行為；(3)美國國內經濟蕭條及蘇聯威脅已經降低之認知，必將促使美國削減其國防預算；及(4)經濟繁榮的日、韓兩國，應當負擔更多的防禦責任，以對本地區提供更直接之貢獻。

基於上述評估，美國已於一九九〇年擬定了在十年內分三階段減少在亞太駐軍的計畫，（註三〇）在每一階段終了時，將進行國家安全評估，以決定進入下一階段之最佳方式。以上的戰略應保持彈性，以應區域之需。除了在安全部署略有調整外，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目標仍與以往相同：維護政治、經濟管道之暢通；保持權力平衡防止區域霸權出現；孕育民主與人權之成果；防止核子擴散等。在此目標下，美國對東北亞政策是以美日安全關係為基石，就是美國國務卿貝克提出扇形理論中的主幹。（註三一）憑藉全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實力，發展出全球夥伴關係。中共雖因冷戰結束，失去在戰略三角中的制衡地位，但美國仍然認為中共在全球與區域問題中仍可扮演積極的角色。而冷戰結束，全人類關注的人

註三〇：U.S.Department of Defens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U.S. Forces in Asia," News Releas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pril 19, 1990, p.1。

註三一：James A.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Foreign Affairs* 70 (Winter 1991/92): 1-18。



權、軍售等問題，將成爲日後中共與美國關係發展的障礙。在朝鮮半島方面，美國已經支持南、北韓對話及同時加入聯合國，目前則積極促成北韓履行反核子擴散條約下的義務，以消除與美美國改善關係的障礙。

冷戰結束，美國仍將適時提供經濟援勵，以促使化們朝向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場的經濟發展，最後將他們融入到西方的體系當中。

## 肆、結 論

從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美蘇關係解凍、東歐民主化浪潮，到一九九〇年代初蘇聯的瓦解，顯示出後冷戰時代確已來臨，在全球體系層次的結構也產生基本的變化。東北亞地區是否也受到相同之影響與具備相同之特性。從以上的簡單分析，茲提出幾點觀察，作爲結論。

首先就東北亞體系結體而言，其組成份子之間的對抗性質仍然存在，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特質仍未在東北亞地區完全顯現出來。東北亞地區不但沒有類似歐洲安全會議的安排，連基本的信賴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也不多見。(註三二)意識形態的對立與領土糾紛，如北方四島、釣魚臺、南沙群島等，

---

註三二：東北亞各國在信賴建立措施方面，雖有倡議，但均未能付諸實行。見William T. Tow, "North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ransforming Competition to Collabo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6(May 1992): 14-18.

仍將成爲危害安全之隱憂。此外，區域內國家軍事預算持續增加與更新武器，也造成對安全的潛在威脅。因此後冷戰時期經濟因素重要性的提升，雖然在東北亞地區亦有相同之現象，但安全與軍事仍爲各國考慮之重點，因此東北亞地區仍未完全跳出冷戰之影響。

其次，民族主義會增強區域內國家的自主性，區域外國家與之交往時，必須認清此種特性，這對美國未來角色的調適尤爲重要。此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雖已消沈，但以民族主義作爲另一種意識形態將產生何種影響，值得注意。在東北亞地區，以民族主義作爲訴求爭取獨立，雖然可能造成國內的不安，但不會像東歐地區一般，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最後，區域經濟合作可作爲信賴建立措施的開端。在經濟與功能性問題上嘗試合作，消除彼此疑慮，進一步以經濟利益爲動因，以尋求政治與安全方面的協商。對於區域內分裂國家而言，這些措施尤爲重要，它們是形勢和緩的先決條件。區域內強權的日本與中共，其戰略意圖與動向，將是決定東北亞地區是否會轉型爲後冷戰和緩時代的主要關鍵。